





## 汉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色诺芬，雅典人，生于埃尔希亚(Erchia)村社的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名叫格里卢斯(Gryllus)。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现无当时确切记载。据他本人在《长征记》中屡次自称年轻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1年时他约三十岁，故其生年约在公元前430年左右。他所著《雅典的收入》一文，约写于公元前355年至354年间，故其卒年当在公元前354年或以后，而不能更早。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IX, 2, 7)中写到德琉姆(Delinm)地方时，曾顺便说到雅典人在这里打过一仗(公元前424年，对方是底比斯人)，色诺芬于战争中落马堕地，幸赖苏格拉底之救，得以不死。有人据此推算，色诺芬约生于公元前444年，因为他既参加德琉姆战役，当时年龄当不低于二十岁。可是色诺芬本人未曾说这件事。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著名哲人传》(II, 48)中谈到了苏格拉底与色诺芬之间的一点早年轶事，但也未说到这件事。斯特拉波所记传闻，在年代上与色诺芬自己的说法出入甚大(如按斯特拉波说，色诺芬参加“长征”时已四十余岁)，因此学者们大都已不信此说。

色诺芬早年曾受教于苏格拉底，可能曾在雅典骑兵部队服役。公元前401—400年，他参加本书所说的“长征”。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一支希腊雇佣军队伍。同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

典被判处死刑。随后雅典也宣布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其理由大概是，色诺芬投靠过小居鲁士，而小居鲁士正是支持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的人。公元前 396 年，斯巴达王阿格西劳 (Agesilaus) 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格西劳幕下。公元前 394 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回到希腊，在斯巴达与其妻子和两个儿子相会。斯巴达政府在奥林披亚附近的斯奇卢斯 (Scillus) 地方给了色诺芬一所房屋和一项地产。他自己也以在雇佣军中的积蓄买了一些地产。斯巴达人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作奴隶。色诺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日以著书、狩猎、宴享朋友为事 (见狄奥根尼·拉尔修, II, 52—53)。公元前 371 年，伊利斯人从斯巴达手中夺回了斯奇卢斯。色诺芬父子逃往科林斯。公元前 369 年，雅典转而支持斯巴达。色诺芬将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在雅典骑兵中服役。大约同时，雅典也废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色诺芬可能不时回雅典去看一看，但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色诺芬是古代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著述内容涉及的方面亦广。除本书以外，他的著作主要有《希腊史》(写公元前 411 年至 362 年希腊历史，具有偏袒斯巴达的明显倾向)、《师门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记苏格拉底的言行，实多色诺芬的拟作)、《拉西第梦的政制》、《阿格西劳传》(多有对斯巴达制度和阿格西劳的溢美之辞)、《居鲁士的教育》(假托对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为的描述，阐发自己的以斯巴达制度为模型的理想)、《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表述色诺芬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在色诺芬的著作中，《长征记》是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种。

色诺芬以卓越的文才,在这部书里缕述亲身经历的事情,自然引人入胜。尤其重要的是,色诺芬在书中以事实揭示了波斯帝国的腐朽性,对以后马其顿、希腊人的东侵起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的作用。马其顿亚历山大在东侵过程中,在与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会战的前夕,对部下作动员,其中就谈到了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军的远征,以此提高部下官兵的士气(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II,7,8)。色诺芬的这部著作对不久以后的历史竟然起了这样重大的作用,人们对于此书的普遍重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的这一部书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西方优于东方的偏见的“根据”。关于这一点,看来有必要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色诺芬在本书中的确用了许多事例说明波斯帝国的软弱,而且还说小居鲁士就说过希腊人多么勇敢而波斯人又多么可怜(见本书卷一,VII)。小居鲁士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无法确证。不过,色诺芬本人还保有希腊人傲视“野蛮人”的传统思想情绪,这倒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指出的是,波斯帝国的软弱,具体表现在帝国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广大人民的离心这两个基本方面。波斯人民不愿为波斯国王效死,表现出帝国的软弱,而非反映人民的软弱。例如,希腊雇佣军在经过卡杜客亚人地区的时候就遇到了极大的打击,色诺芬本人曾说,在卡杜客亚人土地上行军七天所受的苦,比受波斯国王和蒂萨弗尼斯的苦加在一起还多(见本书卷四,III,2)。他们在行经亚美尼亚地区的时候,也遇到了极其英勇的抵抗(见本书卷四,VII,13)。所以,腐朽软弱的只是波斯帝国,而非波斯帝国内的广大的各族东方人民。而且,就波斯帝国的统治阶级

来说，他们也并非从一开始就生性是腐朽无能的。色诺芬本人在《居鲁士的教育》(VIII, 8)中就明确承认，波斯统治者是在居鲁士以后逐渐腐化没落下来的。我们对于波斯帝国的腐朽无能应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和认识。一切因波斯帝国腐朽而蔑视东方人民的见解，都是没有根据的民族偏见，都是不能接受的。

色诺芬在本书中以不少事例说明了希腊人的爱好自由的传统，同时也大体上记载了这一支雇佣军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有些学者片面夸张希腊雇佣军的优点，说他们表现了希腊民族的性格等等(见本书英译本序言，又格罗特：《希腊史》，人人丛书本，第九卷，第252页等)。这就难以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对于这一万左右的希腊人来说，什么是他们的基本的历史事实呢？很简单，他们首先是雇佣军，必然具备雇佣军的基本性格。他们千里营营，为利而来，有什么仁爱可言？有多少理性可说？他们随小居鲁士进军的途中就开始抢劫，在撤退中更是一路以抢劫人民为生。这样事例很多，色诺芬记载时丝毫不以为耻，也没有什么隐讳。色诺芬本人就认为，雇佣军靠从市场购买给养是难以为继的，主要要靠掠夺(见本书卷三，II, 21)，还认为要保持力量，有力量便有机会夺取弱者所有(见本书卷五，VI, 32)。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雇佣军的基本习性，色诺芬也就不以为异、不以为耻了。至于希腊民族性格，这在雇佣军的身上倒是很难说了。这支队伍是由几个希腊人拿了小居鲁士的钱去招募起来的，它的开始组成就与希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终于跟小居鲁士去打波斯国王，也没有想到过什么希腊利益，而只是因为雇主给他们加了饷并给了更多的许诺。小居鲁士死后，波斯国王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中有人已想转而

受雇于波斯国王,只是他考虑到放下武器有生命危险,才没有这样做。他们抗拒波斯国王,不是为了维持什么希腊人的自由或民族气节,更不是为对小居鲁士的忠贞,而是出于自己切身利害的考虑。色诺芬在雇佣军将领被波斯人诱杀以后对同伴们作了一次鼓励性的讲话。他说,希腊人的祖先打败了波斯的入侵,保卫了希腊的自由,现在要继承祖先的传统。他又说,雇佣军已经显示过自己的勇气,不过那是为了帮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现在是为了大家自身的生存,所以更应该拿出勇气来了(见本书卷三,II)。他的话的确很能说明问题:过去的希腊人抵抗波斯,是为了保卫希腊的自由和城邦的自主;而现在这一班雇佣军所保卫的只是他们的自身。须知构成雇佣军的都是从希腊各城邦中游离出来的分子。他们在自己的母邦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相应地对母邦也不再尽任何义务。他们是衰朽中的希腊城邦母亲所遗弃的孤儿,投奔谁呢?只好“有奶便是娘”了。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高度赞美之辞,他甚至说小居鲁士比任何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受到了更多人的爱戴(见本书卷一,IX)。可是,正是这个小居鲁士,他支持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色诺芬的母邦雅典,几乎使雅典陷于灭亡之灾。对于这一点,色诺芬似乎全都遗忘了,而所难忘的却是小居鲁士的有劳必报的豁然大度。这也可以说是雇佣军的性格在色诺芬身上的一点体现。我们还不能忘记,在以后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也曾有希腊雇佣军站在波斯方面对马其顿希腊人进行坚决的抵抗(见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I,16)。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军的一个基本性格就是缺乏民族性格。希腊雇佣军既已成雇佣军,其缺乏民族性格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这里，我们对于希腊雇佣军的一切缺点同样要作阶级和历史的分析，认识那都是希腊城邦矛盾发展的产物。如果把希腊雇佣军的一切缺点都简单地归之于希腊民族性格，那将同样是一种不可取的民族偏见。

刘家和

1983年8月



## 英译本序言

色诺芬所著《长征记》<sup>①</sup>叙述了小居鲁士<sup>②</sup>为了要夺取波斯王位,对他哥哥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二世进行远征;居鲁士死后,他属下的希腊“万人大军”退军攸克星海;最后他们回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故事。

居鲁士发动这次结局不祥的征战是在公元前401年。在那以前,他在希腊历史上已经是相当突出的重要人物。公元前431年到404年间,雅典和斯巴达为争霸而发生的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将近结束时,斯巴达人已经同吕底亚和爱奥尼亚的波斯总督、小亚细亚西部波斯军司令官蒂萨弗尼斯结成同盟。蒂萨弗尼斯希望借助斯巴达人的力量恢复对亚细亚海岸原属波斯统辖而现在归属了雅典帝国的希腊城市的统治;而斯巴达人则将得到他的资助以维持其舰队。但蒂萨弗尼斯生性是一个两面派人物,而且他听信了雅典人阿尔西比底斯的话,认为使希腊敌对双方都不得胜,疲于久战、并趋衰竭才对波斯有利。因而不久他便削减、并且最后完全停止了原订对斯巴达人所许诺的金钱支持。当斯巴达人对这种背信行为向当时在位的波斯王大流士二世提出抗议时,大流士委派

---

① 《长征记》这一书名的原文词义是由海岸往内陆较高地方的行程,特指著名的由希腊小亚细亚海岸至波斯都城苏萨的行程。实际上此词只适合于色诺芬叙事的前部。——英译者注

② 一般这样称呼以别于波斯帝国创建人居鲁士大帝。——英译者注

其次子居鲁士出任吕底亚、大弗里吉亚及卡帕德西亚总督兼全部小亚细亚西部军事司令官。这样一来，实际上居鲁士便顶替了蒂萨弗尼斯，解除了他的军权，只剩下他原来辖区的小部分——爱奥尼亚。

居鲁士于公元前 407 年就任了各项要职，当时他年仅十七岁。他秉承大流士意旨，全心全力地支持当时好象时运最为乖厄的斯巴达。在执行这项任务中，他表现精干、热忱而直爽。他所给予斯巴达人的援助无疑是使他们最后战胜雅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也许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不久，在公元前 405 年，居鲁士奉召离开小亚细亚职位来守候在垂危的父王床边。由于参与战事，他有机会了解到希腊士兵和希腊战术远优于波斯士兵和波斯战术，并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好多军官建立了友谊关系。此外，在这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于公元前 404 年结束时，成千上万的士兵解除了军职。他们别无专长，不愿转入和平行业。这些情况说明何以居鲁士不但愿意，而且能够征集希腊人来进行不久以后他所从事的巨大事业，企图夺取他哥哥阿尔塔泽西斯的王位。

在大流士死后，阿尔塔泽西斯继承了王位（公元前 405 年）。他听信了蒂萨弗尼斯的谗言，认为居鲁士阴谋反对他，便把他予以拘捕。居鲁士受辱、怀怨，这便是色诺芬在他的《长征记》中所提供的唯一要长征去夺权的原因。从其它资料我们得知，居鲁士本来指望大流士会指定他为王位继承人。一来因为他是皇后的宠儿，而更多地是因为他是“皇荫贵生”，即大流士即位后所生，阿尔塔泽西斯则否。事实上，八十年前的泽尔士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被选定

为波斯国王，排除了他的一位兄长。

色诺芬是他在《长征记》中所描述的事件的亲身参加者和目击者。他参加这次长征，“不是作为将官或队长或士兵，”而是应居鲁士帐下一名希腊将军、他的朋友普罗克西努斯的极力邀请。那时色诺芬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光景；虽然他比较年轻，而且是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中的雅典人<sup>①</sup>，然而在这场著名的万人大军退师当中，他确实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的描述是直接、爽快、谦详和自然的。

关于《长征记》的编写年代一直有争论。但几乎不容置疑，这部记事著作是根据色诺芬在行军中按事件进行过程所做的详细记载写成的。内在的证据，即表明《长征记》是色诺芬的一部早期作品的文体特征，证实了这个自然的假定：即它的定稿是在这些事件在作者和国人的思想上记忆犹新的时候。另一方面，第五卷里一段个人身世的插叙可能是晚至纪元前 370 年写的。还有一点，色诺芬在约于纪元前 380 年写的《希腊史》中有一段提到居鲁士长征时，他请读者参阅“叙拉古人提米司托格尼斯”所著的关于这次长征的历史。这就显然意味着那时他自己的《长征记》还没有问世。把这些相互矛盾诸点做一番合理的调和，得出如下见解：色诺芬的《长征记》是作者在纪元前 394 年从亚洲回到希腊后不久，便以差不多接近现在这个形式写成的，但直到约纪元前 370 年才发表。据认为，很可能是色诺芬想让一部突出表现了他自身的作品推迟到晚年才予以发表。

万人希腊大军从萨尔迪斯进军到巴比伦门户，再由此回师到

<sup>①</sup> 居鲁士以前的交往联合只限于伯罗奔尼撒人。——英译者注

攸克星海的希腊沿岸，这是历史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轻而易举地击败比他们多好几倍的波斯军，尽管阿尔塔泽西斯极力阻截，他们仍得以安全回师。这向所有的人表明，这个炫赫一时、颇为人们所畏惧的波斯大帝国是全然软弱无力的。希腊政治家和军事要员很快便得到启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sup>①</sup>：“这位年轻的学者、哲学家〔色诺芬〕，在所有的首领于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杀害之后，率领这支陆上万人大军穿过广阔王土心脏地带，安全地从巴比伦回到希腊。此事震惊了世界，并鼓舞了后来希腊人入侵波斯王土。正如以后塞萨利人约森所拟议，斯巴达的阿基西罗斯所企图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完成的大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位年轻学者的行动感召下进行的。”

一方面万人大军的长征向希腊人显示了波斯的软弱，而色诺芬对此举的叙述却向我们极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些追名逐利的希腊雇佣军的优良品质——他们勇敢而坚忍，虔诚而仁爱，自主而理智。作为不畏艰险的真正军人，他们仍然是酷爱自由的希腊人。对他们只能得其同意而治之，在共同关心的事业上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协商。他们被名符其实地称为“行进的民主”，“游动的共和”，“深思熟虑而行动；一面战斗，一面表决；一幅行动在亚细亚中央的雅典缩影。”其“雇佣”军且是这样的人物，即此便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力量、性格和脾性。

《长征记》之所以可贵还在于它提供了希腊人的战争艺术知识，对军事科学做出了切实贡献。色诺芬是，或者说在退军过

---

<sup>①</sup>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这段话见其所著《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崇学论》) I vii 30。——译者

程中成为一名非常有才干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对每一个问题都以学者和思想家的精神进行探讨，而后把他的深思熟虑的决断体现为兵法。永远足智多谋，以新的战术应付新的情况，从来不落于常规的羁绊。他的独创和发明的天才对后来希腊兵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一直传留到现代。一位现代军事科学研究者<sup>①</sup>写道：“在亚历山大以前，对我们最有教益的军人毫无疑问地是色诺芬……。是他向世人指出退师的战术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指挥一支后卫部队。《长征记》所给予我们的战术独创性胜过若干部其它任何书籍……。经过了二十三个世纪，还没有比《长征记》更好的军事教程。”

最后，色诺芬对史实的叙述简洁而典雅，引人而生动，使它在旅游、探奇记叙说部当中占有极高的地位。泰恩<sup>②</sup>在谈到《长征记》时甚至说，“其文体风格之美妙赛过其故事情节之动人。”的确，色诺芬作为文人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长征记》这部书的。

---

① 西奥多·阿·道奇上校所著《亚历山大》第 101 面以下。——英译者注

② 泰恩(Hippolyte Adolphe Taine): 法国文艺评论家和史学家(1828—1893)。

## 目 录

英译本序言	1
卷一	1
卷二	36
卷三	60
卷四	85
卷五	114
卷六	143
卷七	168
译名对照表	208



## 汉译本序言

本书作者色诺芬，雅典人，生于埃尔希亚(Erchia)村社的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名叫格里卢斯(Gryllus)。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现无当时确切记载。据他本人在《长征记》中屡次自称年轻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1年时他约三十岁，故其生年约在公元前430年左右。他所著《雅典的收入》一文，约写于公元前355年至354年间，故其卒年当在公元前354年或以后，而不能更早。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IX, 2, 7)中写到德琉姆(Delinm)地方时，曾顺便说到雅典人在这里打过一仗(公元前424年，对方是底比斯人)，色诺芬于战争中落马堕地，幸赖苏格拉底之救，得以不死。有人据此推算，色诺芬约生于公元前444年，因为他既参加德琉姆战役，当时年龄当不低于二十岁。可是色诺芬本人未曾说这件事。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著名哲人传》(II, 48)中谈到了苏格拉底与色诺芬之间的一点早年轶事，但也未说到这件事。斯特拉波所记传闻，在年代上与色诺芬自己的说法出入甚大(如按斯特拉波说，色诺芬参加“长征”时已四十余岁)，因此学者们大都已不信此说。

色诺芬早年曾受教于苏格拉底，可能曾在雅典骑兵部队服役。公元前401—400年，他参加本书所说的“长征”。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一支希腊雇佣军队伍。同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



典被判处死刑。随后雅典也宣布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其理由大概是，色诺芬投靠过小居鲁士，而小居鲁士正是支持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的人。公元前 396 年，斯巴达王阿格西劳 (Agesilaus) 在小亚细亚对波斯作战，色诺芬投身于阿格西劳幕下。公元前 394 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回到希腊，在斯巴达与其妻子和两个儿子相会。斯巴达政府在奥林披亚附近的斯奇卢斯 (Scillus) 地方给了色诺芬一所房屋和一项地产。他自己也以在雇佣军中的积蓄买了一些地产。斯巴达人还把一些战俘送给他作奴隶。色诺芬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日以著书、狩猎、宴享朋友为事 (见狄奥根尼·拉尔修, II, 52—53)。公元前 371 年，伊利斯人从斯巴达手中夺回了斯奇卢斯。色诺芬父子逃往科林斯。公元前 369 年，雅典转而支持斯巴达。色诺芬将两个儿子送回雅典，在雅典骑兵中服役。大约同时，雅典也废除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色诺芬可能不时回雅典去看一看，但一直在科林斯终老。

色诺芬是古代希腊的多产作家之一，著述内容涉及的方面亦广。除本书以外，他的著作主要有《希腊史》(写公元前 411 年至 362 年希腊历史，具有偏袒斯巴达的明显倾向)、《师门回忆录》、《苏格拉底的辩护》(记苏格拉底的言行，实多色诺芬的拟作)、《拉西第梦的政制》、《阿格西劳传》(多有对斯巴达制度和阿格西劳的溢美之辞)、《居鲁士的教育》(假托对波斯开国君主居鲁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作为的描述，阐发自己的以斯巴达制度为模型的理想)、《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表述色诺芬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在色诺芬的著作中，《长征记》是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种。